**我赶上了最好的时代**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

原副理事长 卢迈

我于1947年出生在新加坡，1949新中国成立就回到祖国。父亲为我起名“迈”，取“抗日战争已达最后胜利的目的，但中国人民革命尚需继续迈进”之意。

我的父亲卢心远生于1911年，1927年16岁时参加革命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4年，他辗转来到上海，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研究和著述。1938年日本占领上海，父亲不得已远渡新加坡。他先在《南洋商报》任主笔，写文章激励海外侨胞支持抗战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出任中学教导主任和教师，参与发起新加坡华侨教师公会，并被推举为首任主席。

在新加坡，父亲曾因推动爱国民主运动、支持祖国人民解放战争被英国殖民当局两次逮捕。1948年，父亲被关入棋樟山集中营，8个月的牢狱生活使他亲身体会到英国殖民者的残酷暴虐，也深切感受到骨肉同胞的阶级情谊。他在狱中宣传马克思主义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祖国革命大好形势，鼓舞狱友坚持抗争。1949年4月父亲被“驱逐出境”，当局计划是将他押送到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，幸好途径香港时得到地下党帮助，于1949年5月辗转到达北京。

抵京后，父亲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，被安排在全国政协筹备会新闻处工作，后担任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届政协委员。1950年1月，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主任，从此一生从事侨工作。

父亲这一代华侨对殖民地、旧社会有深切的体会，深知只有祖国好，海外华人才有靠山，中国人到各处才能挺直腰板。“文革”后新加坡学生来京看他，见他居住狭促、家具简单，没有冰箱和空调，连称没想到，问父亲是否后悔回国？父亲回答：不后悔，因为困难都会过去，中国发展是不可限量的。

父亲以为国家发展做贡献为己任，去世前仍心系国家侨务工作。他曾多次对我说，当年从福建永定田心村出来参加革命13人中，只剩下他与海军副政委卢仁灿两人，其他人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，他们应被永远怀念。

我20岁后上山下乡，30岁后上大学，40岁出国学英语、念硕士，50岁后出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。但我是幸运的，祖国的发展给了我发挥所长的机会。1999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，我接到任务，要针对海外企业家筹办一个高端国际论坛。2000年，第一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办，27位来自美欧的企业家和学者参会，朱镕基总理会见外方代表，时任副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，确立了论坛的高规格。此后二十二年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秉持“与世界对话，谋共同发展”的宗旨，随着祖国的发展，成长为了中国重要的经济外交平台。

每年“两会”后，代表们云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论坛。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、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等超过200位世界级企业家都是与会代表。这些企业家为什么重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，愿意花3天时间在会上？我想原因之一是论坛以中国发展为主题，随着中国国力提高，其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吸引着世界的目光。另外论坛注重理性、务实交流，不回避敏感问题，我曾在关键时间点组织讨论新疆暴恐、反腐败、一国两制、中国政治转型、中美脱钩等问题，力促中外沟通理解。

此外，论坛在中国政府和外国企业家之间搭建“双向沟通”机制，对双方均有很大吸引力。论坛的最高潮——也是最让我自豪的时刻，无疑是总理会见。朱总理曾直接对外方代表表示“一定重视各位代表的意见，改革或改善中国政府的工作”；李克强总理曾说，外国企业的建议和论坛简报，自己虽然不能每份都细读，但一定会看摘要，也会要求部委们仔细研究。总理们风格不尽相同，但他们开诚布公、高屋建瓴的谈话都给外方企业家极深印象，也使在场的我倍感自豪。世界保险大亨、史带集团创始人莫里森·格林伯格曾告诉我，参加如此开放而坦诚、讨论涵盖面广泛的会议本身已经说明了中国的开放与变革。多位企业家都对我说，如果每年他们只能参加一个论坛，那就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。

二十多年来，我年龄渐长但仍一直工作在一线。筹备论坛几个月，有时夜里睡觉在梦里想起要安排的工作，醒来后马上实行。我始终以服务者的心态办论坛，力求为国家发展多做贡献。

作为归国华侨，我对社会公平问题一直十分敏感。2006年，基金会团队赴广西都安调研，他们带回的一批照片印证了我的担心。

这张照片来自广西都安县“三只羊小学”，照片中的孩子蹲在操场上准备吃午饭，饭盒里只有盐水黄豆和米饭，这些寄宿校的学生每天的中饭和晚饭都是如此。北方的调查更让人揪心，在宁夏同心县，学生带着一周的馒头上学，每天就着开水啃干馒头。这是在2006年，粮食连年增产、农民增收，可农村孩子却连最基本的营养都无法保证。

孩子们手捧黄豆饭的和发霉馒头的样子让我久久不能释怀。2007年，我带领同事到广西都安和河北崇礼开展学生营养改善对照试验。推动一项政策落地有从形成共识到逐步完善的过程，我们的试验结果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，但是从2007年开始社会试验到2011年形成国家政策，仍然花了四年时间。2011年起国家实施“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”，中央政府每年按200天提供每天3元的膳食补助。为了评估政策实施效果，我主导建立了阳光校餐数据平台，实时监测全国一万所学校供餐情况。2021年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十周年之际，基金会受教育部委托开展评估，结果显示与2012年相比，15岁欠发达地区农村男生、女生分别高出约10、8厘米，与城市儿童身高差距大幅缩小，农村孩子实现了“追赶式生长”。

今天全国已有4000万受益孩子从义务教育阶段毕业，因为学生时期营养保障，他们成为没有饥饿感的新一代，有良好的专注力和社会情绪，有健康的身体，将成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。

以校餐为开端，我们继续以“社会试验+政策倡导”的模式在农村开展了山村幼儿园、山村入户早教等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工作。

我们的项目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、民政部等方面的肯定，我也相继获得“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”、“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个人”等荣誉褒奖。

今天，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，我们党即将召开二十大。我去年退休，现在还会参与基金会的一些工作，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一华人华侨期盼的伟大事业，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。